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库

老舍选集

(上)



老舍

山东文艺出版社

老张的地位：村里的穷人都呼他为“先生”。有的呢，把孩子送到他的学堂，自然不能不尊敬他。有的呢，遇着开秧榜，批婚书，看风水，……都要去求他，平日也就不能不有相当的敬礼。富些的人都呼他为“掌柜的”，因为他们日用的油盐酱醋之类，不便入城去买，多是照顾老张的。德胜汛衙门里的人，有的呼他为“老爷”，有的叫他“老张”，那要看地位的高低；因为老张是衙门里挂名的巡击。称呼虽然不同，而老张确乎是镇里——二郎镇——一个重要人物！

——《老张的哲学》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库

老舍选集

(上)

孔范今 编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库

老舍选集

(下)

孔范今 编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选集/老舍著;孔范今编选.—2版.—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5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库)
ISBN 7-5329-1337-6

I.老… II.①老…②孔… III.文学—作品综合
集—中国—现代 IV.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986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2 版
200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7 插页/2 千字/894
定 价 37.00 元(上、下)

前 言

孔范今

老舍（1899—1966），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文学史上素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此说固然首先强调的是前后两者在历史性立场上的区别，但从文学史的结构意义上如此并举列出，亦可足证其地位的显要。

四十余年前，当老舍的创作生涯已历二十个春秋时，郭沫若曾作诗奉贺：“我爱舒夫子，文章一代宗。交游肝胆露，富贵牛马风。脱俗非关隐，逃名岂畏穷。国家恒至上，德业善持中。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民间风广采，域外说宏通。健步谢公履，高歌京洛钟。更因豪饮歇，还颂万年松。”^①虽然郭沫若标榜什么人时常带感情色彩，难免溢美之嫌，此诗又为奉贺之作，似乎也不能完全较真；但是，从为人到为文，从职责理解到文化选择，从创作原则到文体风格，它对老舍的若干基本点确实作了比较全面而准确的把握。

然而，像许多知名的现代作家那样，老舍在被社会接受甚至被赞美的过程中，也没有逃脱被误读误解的命运。对老舍来

^①《民国三十三年春奉贺舒兄创作廿周年》，载1944年4月16日昆明《扫荡报》。

说，在其生前曾有过两次人生的风光：一次是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四年，即郭沫若作诗奉贺时，因其创作的显著业绩和对“文协”工作的贡献，文艺界举办了“老舍先生创作生活廿周年纪念会”，众多知名人士或以诗或以文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那时，文艺界的统一战线还在维持，抗战前各种“立场”的不同仍不能堂而皇之地表示出来，因此在较大的涵容中对其彼此相关的不同侧面和富有个性的价值存在，都能予以认可，尽管所作的评价高则高矣，却未免失之于笼统。再一次是建国初的一九五一年，因《龙须沟》的成功，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以致嗣后在其生前身后（“文革”这一非正常时期除外）这一定位性称谓成了评价他必遵的准绳。“人民艺术家”对于老舍来说确为当之无愧的殊荣，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定位确当而毋庸置疑的。但应予以注意的是，在其时特定语境中使用这一带有统战意味的概念时，事实上在对其作出高度的肯定同时也包含着政治评价上的保留和期望。如果比照一下这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撰中，对“鲁、郭、茅，巴、老、曹”的位置摆放，其内蕴的区别便不言自明了。这在老舍，自然得到了一种激励，但他凭着新的责任理解，力图以对新生活的积极表现来作为对这一荣誉的回报，并企图使自己的创作与新的生活律动贴合得更为紧密时，他的创作却令他无可奈何地变成了一种超个性的文学行为。在新的价值规约中，在批评界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对老舍的评价上，也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主导性立场趋同，只能在趋同的范围内索解，而难以对其创作的基本倾向进行客观分析、体认，难以对其作品作完整性文本阐释的新的读解趋势。也许，在建国后的这数十年来，对老舍的分析研究，可称得上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又一种特异的现象。同样都是被推重的对象，但对老舍

前 言

的评价方式既不同于鲁迅，也不同于茅盾，还不同于巴金。鲁迅是被视为“现代圣人”，很长时间内对他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从不同的角度探寻其作品乃至某段话语的微言大义，这是一种方式。茅盾被推为左翼文学的巨匠和“社会分析”派小说的代表，因而对他的作品多是作政治方面的社会分析，并以此为尺度和以《子夜》为样板，对其前后创作和作品中的得失做出轩轻，这又是一种方式。对巴金就又不一样了。无论在现代还是当代，巴金虽然一直不懈地追求进步和光明，但却因其与权力中心话语的某种对视所造成的彼此间的疏离感，因此对其作品政治性历史意义的认同性评价，便在权力性主导话语中失去了可作依赖的保障。对他，人们虽然在文学史的既定框架中可以极尽推崇，但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对其方方面面进行检视和作出见仁见智的分析。这或许也可以算作一种方式。对老舍进行分析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与巴金相比，他的幸运是得了“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除“文革”时期以外，这一非政治性的但又带有政治权威性的定论，已经固定了他的高度，人们只能围绕它做文章，而不能背离这一遵循。因此，评价老舍，固然不能用对鲁迅乃至对茅盾的方式，但又毕竟与对巴金的方式不同。可是，按照人们在很长时期内所惯于使用的政治性价值尺度和对解读文学的历史性“意义”模式来看，老舍创作的“意义”选择和对政治变革行为的不同理解，又分明难以作出全面性的合理解说，于是就导致了两种情况的必然出现：一是对其创作尤其是前期作品中关乎政治和社会革命内容的回避，对《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乃至《骆驼祥子》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避而不论，或仅以轻描淡写的数语带过，至于以此为侧重而且态度更为直露的《猫城记》则更少涉及，使这部作品直到新时期才得以重新面世，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它的存在；一

是在对其作品的意义阐释上，不无勉强地向当时文学的主流话语贴近。这样做的结果，则不仅在老舍研究中留下了若干疑窦，而且更直接影响了老舍本体意义的确认及其独到贡献的正确理解。

评价一个作家，看他对历史对文学做出了什么贡献，不容忽视的一个基本准则，应该是要看他历史对文学有什么独到的理解和富有个性的价值呈现。诚然，从与历史深在要求的契合方面看，无论作家们对历史责任的理解和承担有多少不同，但都必须与其总体性的基本要求一致。可是，历史的深在要求为作家们提供了与之对话的多种可能性，而为其文学创造所提供的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不能以一种理解、一种方式、一种表现作划一的律定。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时期的历史，是由多种“立场”或者说不同角度的努力组成的，即便为我们认定为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选择，比如启蒙的或者救亡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也或者是由其自身的模糊性而很难作出这种界分的，就各以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呼应着历史的要求，并在互动互补的状态中丰富着历史的内容，调节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特有的历史结构状态和调节过程，一方面常常使作家们遭遇困惑，一方面却也给现代文学开辟了多样性发展的天地。面对这样一种特别复杂、多动而又极富生成能力的历史和文学的时代，我们对其间作家们的选择和创造，就更不宜于作任何简单化的褒贬性评价了。就老舍而言，对其价值的评判，应由对其独特“立场”、独特态度和独特表现对象的全面把握和紧贴其个性呈现的科学阐释而来，他的“意义”，应在其个性化的世界里寻找。过去的失误，不是说就没有注意他文学创造的个性呈现，而是在于对其个性的“共性”内涵上作了又游离于个性的趋同性比附。任何一个作家，他以什么姿态与历史与文

学进行对话，既有其历史的原因，亦有其个人的原因，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其生命个体与历史的独特连接决定并完成着自己的对话姿态的。我们应予寻找的，恰恰就应该是这种连接、这种姿态。正是这种互不相同的连接和姿态，才是他们的“意义”生成的独异之处，才是他们对趋同性或共享性“共性”的开拓和丰富。

老舍的一生，始终不能忘怀那苦难的过去。他出身于北京的基层市民社会，父亲只是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在与入侵的八国联军作战时阵亡；母亲出身农家，靠给人缝洗和做杂工的微薄收入，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本人，是在乐善好施的刘大叔（后出家，号宗月大师）帮助下，才得以入塾就读。后来，终因学费问题而只是读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小学校长、劝学员，以其薪水补贴家用。这种出身与经历，对他的影响之大，在其嗣后对历史对文学的态度中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经常提起自己的出身经历，而且据此解释他的为人和为文。譬如他曾这样解释他的“理想”：“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①他把《赵子曰》中的“理想”解释为“中年人的理想”，虽然他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个中原因是：“因为穷，所以作事早；作事早，碰的钉子就特别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②又如，在解释自己的“幽默”时说：“在我的作品里，我可是永远不会浪漫。我有一点点天赋的幽默之感，又

①② 《我怎样写〈赵子曰〉》，原载1935年10月1日《宇宙风》第2期。

搭上我是贫寒出身，所以我会由世态与人情中看出那可怜又可笑的地方来；笑是理智的胜利，我不会皱着眉把眼盯在自己的一点感触上，或对着月牙儿不住的落泪。”^① 在揭示《老张的哲学》创作中情感与理智的互相节制的状态时，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我个人的性格与环境。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恶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② 再如，在文化经历和文化精神影响方面，他曾坦言刘大叔即后来的宗月大师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给予他的好处^③，亦不讳言对于“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的向往^④，而且希望以佛学之力“推动中国灵的文学，灵的生活”^⑤。对于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他早年也给予热情的关注，在其担任京郊的一些教职时，经常参加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堂举办的社会服务工作，并曾受洗加入基督教。后来到了天津南开学校任教时，发表的第一篇译文便是《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他希望天国的理想在人间实现，像对待佛教一样，把基督大国主义看做引导人们向善的精神力量，由此而给以认同；但是，他虽曾受洗，其结果也仍然像不会去做和尚一样，最终也成不了真正

① 《写与读》，原载 1945 年 7 月 5 日《文哨》月刊第 1 卷第 2 期。

②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原载 1935 年 9 月 16 日《宇宙风》创刊号。

③ 《宗月大师》，原载 1940 年 1 月 23 日成都《华西日报》。

④⑤ 《灵的文学与佛教》，原载 1941 年《海潮音》第 22 卷第 2 号。

的基督徒。因为他立身处世的现实主义原则，和令其无法彻底走出的那种既叫人厌恶又叫人动情的世俗生活氛围，都只能让他走上他事实上走着的那条自律而又不自律的路。可是综合的影响是深刻的，他本人多处阐发的为人为文的态度和见解，就均可见其端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老舍这样如此主动、准确地从出身经历阐释自己的人生和创作倾向的作家并不多见。这种经历和理解，综合成为一种独特的个性呈现，老舍的意义在这里生成，而关于老舍的似乎是矛盾的和不易理解的问题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只是所令人可惜者，是我们的批评和研究，并没有抓住这一极为重要的基本点，以致出现了上述的回避和偏离。

在对老舍的评价上，建国后尤其是近些年来，回避最多也是最为敏感的，就是他对政治性革命的态度问题。建国前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前，老舍所遭遇到的最尖锐的批评，莫过于在这一方面了。批评者上“纲”最高的是巴人，他在谈到人物塑造的“类型”性即他所谓的“世俗的”倾向时，就是以《骆驼祥子》为例而痛下针砭的。而且紧接着指出：“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将革命者看作是‘为钱出卖思想’，这正是单看现象、不明实际的‘世俗的’看法。这个‘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骆驼祥子》被批评家所称道，但没有从这种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予以批判，实在是怪事。”^①尽管像这样上“纲”批判的只是巴人一人，但在革命文学阵营中，私下对老舍在这方面的表现持有异议者怕是并非在少数。就是在祝贺他“创作生活廿周年”时，矛盾在贺文中也还是委

^① 《文学读本》，珠林书店1940年10月出版。1950年1月此书改版为《文学初步》，由海燕书店出版。



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一方面真诚地评价了《赵子曰》的成功：“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面，我感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一方面同时又指出了“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①。就现在来看，我们固然决不会同意巴人那种观点，但实事求是讲，茅盾和老舍“所取观察的角度”确实是有明显区别的，至于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在对待社会政治革命的态度上，我们不必讳言老舍的成见和在前期作品中不无厌恶的描写和议论。他自己讲过，那时“自己对革命斗争既无认识，又无热情。在文艺与政治斗争当中，我画上了一线条；我是搞文学的，政治是另一回事”^②。那时的他，对政治斗争的确是比较隔膜甚至怀有成见的。也许是因为他过早地负起了生活的重担，使其对生活的理解和所接触的人物，都与正以激动人心之势进行着和发生着深远影响的“五四”运动拉开了距离。在解释《赵子曰》的创作时，他说：

在写“老张”以前，我已作过六年事，接触的多半是与我年岁相同和中年人。我虽没想到去写小说，可是时机一到，这六年中的经验自然是极有用的。这成全了“老张”，但委屈了《赵子曰》，因为我在一方面离开学生生活已六七年，而在另一方面这六七年中的学生已和我作学生时候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即使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学校生活也无补于

①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原载 1944 年 4 月 17 日重庆《新华日报》“新华副刊”。

② 《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原载 1951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报》。

事。“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有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所以《赵子曰》之所以为《赵子曰》，一半是因为我立意要幽默，一半是因为我是个看戏的。我在“招待学员”的公寓里住过，我也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于是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与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今天想起来，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吃了极大的亏，《赵子曰》便是个明证，它不鼓舞，而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①

在当时的老百姓尤其是市民社会中，构成了一段时代特征的学生运动并没有被理解，也没有被接受。“学生们开会，学生们走街，学生们演说，学生们男女混杂。连被强迫退了学的学生们也偷偷的出来参加。不久就由人们造出个名词来——‘闹学生’；和闹义和团，闹鬼子，闹大兵的闹是一个字。”^②连赵子曰这种混学校的青年也以为：“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军阀与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见识一些‘新文化主义’。不打外国人的军阀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军阀的资格。不打军阀的学生要是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赵子曰为了做“有志气的青年”，就去赶“学潮”。他的行为在小说中为作者以讽刺幽默的笔墨书

^① 《我怎样写〈赵子曰〉》。

^② 《牛天赐传》。

写,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践行了为民众所否定了的一种认识。作为世俗社会中的一员,他和民众对学生运动的认识都起脚于同一种误解,但他与一般民众的不同处,是他以畸变的心理给予了认同和追趋。老舍似乎是在以与一般民众趋同的理解来认识赵子曰乃至学校风潮的,结果在他笔下,所象和表现出的,则又几乎完全是负面的景象:

大门碎了,牌匾摘了,玻璃破了,窗子飞了。校长室捣成土平,仪器室砸个粉碎。公文飞了一街,一张整的也没有。图书化为纸灰,只剩下命不该绝的半本《史记》。天花板上团团的泥迹,地板上一块块的碎砖头。……

校长室外一条扯断的麻绳,校长是捆起来打的。大门道五六只缎鞋,教员们是光着袜底逃跑的。公事房的门框上,三寸多长的一个洋钉子,钉着血已凝定的一只耳朵,那是服务二十多年老成持重的(罪案!)庶务员头上切下来的。校园温室的地上一片变成黑紫色的血,那是从一月挣十块钱的老园丁鼻子里倒出来的。

看来,老舍的确是不大喜欢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殃及无辜的“斗争”行为。不仅对于学生运动,而且对于其他政治斗争也是如此。在《二马》的篇首,在他当作背景写到伦敦劳资双方的对峙时,就发表了这样的议论:“打着红旗的工人,伸着脖子,张着黑粗的大毛手,扯着小闷雷似的嗓子喊‘打倒资本阶级’。把天下所有的坏事全加在资本家的身上,连昨儿晚上没睡好觉,也是资本家闹的。紧靠着这面红旗,便是打着国旗的守旧党,脖子伸得更长,(因为戴着二寸高的硬领儿,脖子是没法缩短的。)张着细白的大毛手,拼着命喊:‘打倒社会

党。’‘打倒不爱国的奸细。’把天下所有的罪恶都摞在工人的肩膀上，连今天早晨下雨，和早饭的时候煮了一个臭鸡蛋，全是工人捣乱的结果。”在这里，他对对立双方的态度都有所保留，实际上是对这种解决问题的各怀偏激的冲突方式持有不同的见解。本来，写这一类的内容并非老舍的所长，但由于对这一问题挥之不去的反感，以致发展成了较为集中的思考和表现，这就是一九三二年写成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在这部作品里，老舍以寓言的形式，借一个古老国度“猫城”的故事，对我国的政治现状进行了全面批判。在这里，“有学校而没教育，有政客而没政治，有人而没人格，有脸而没羞耻”，“已无政治经济可言”，可是“免不了纷争捣乱”。学生闹风潮，宰杀校长，拆房毁物，但比较起政客们来则是又当别论的了。作品中的“我”认为：“只责备学生，我知道，是不公平的，但我不能不因期望他们而显出责备他们的意思。我必须看政治了。”可是政治改革呢，那只是“哄”，是政客们的一种职业，与“平民”无关。“哄”的结果，是“政治只有变动，没有改革”。“民主思想越发达，民众越贫苦”；是“政哄越多，青年们越浮浅”。在这部作品中，不能不说，老舍无拘无束地集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痛快淋漓地倾泻了胸中的郁积；但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就其所短写下的这部作品，无论从思想观念上还是从艺术表现上来看，都很难说是成功之作。

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老舍对政治斗争确实取了别样的态度，与当时越来越明晰呈现出来的主潮性文学话语拉开了不小的距离。但是，他与“学潮”和政治斗争的对视，实质上并不是政治立场的对抗。虽然他的理解不乏“旁观者”的误解，在表现上也有较大的片面性；然而，他却没有以政治性介入的姿态，选择政治冲突中非此即彼的哪一种立场。对于老舍来说，

如果说“立场”，那他始终坚持的是一个“国民”的责任和视角。他给予责任承诺的对象不是哪一个政治集团的利益，而是为每一个国民都利益攸关的“国家”，或者说与“国家”视为同义的“民族”。他认为：“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①而且还认为：“在亡国的时候才理会到一个‘人’与一个‘国民’相互的关系是多么重大！”^②只有理解了这一点，人们才会真正懂得，一个似乎是厌恶政治斗争的人，为什么在国家危亡之际即抗战时期，能以那么高的热忧和牺牲精神，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之中。他不惜中止已经得心应手的小说创作，而宁肯去创作那些宣传时效显著的通俗文艺。他说：“国家是我们今日的爱人，我们必须为她死，为她流血。”^③而且坚决地认为：“我们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④他这种在国难当头，能够以一个“国民”的责任献身于国家利益的崇高精神，值得后人永世钦仰！明乎此，即可了解，老舍在上述倾向中所表露出来的态度，充其量只是一个“旁观”的爱国者在对“国事”失望时所表达的愤激之情，与政治立场的反动与否不可同日而语。他自己说过，“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和建议”^⑤；在解释《猫城记》的写作动机时也说，“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⑥。可见，就他而言，所表现出的不过是一种隔膜中的误解而已。

① 《二马》。

② 《猫城记》。

③ 《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原载1938年4月23日《民意》第18期。

④ 《这一年的笔》，原载1938年7月7日汉口《大公报》。

⑤⑥ 《我怎样写〈猫城记〉》，原载1935年12月1日《宇宙风》第6期。

而就其对“国家至上”的利益关怀看，倒也不失其精神的闪光。

究其实质，老舍对学生风潮和政治斗争的否定性态度，所表达的只是一种文化的观照。老舍从一开笔创作《老张的哲学》起，即已确立了文化批判的立场和角度，这是由其书名就可以见出的。到了《赵子曰》，他说：“也可以说《赵子曰》是‘老张’的尾巴。自然，这两本东西在结构上，人物上，事实上，都有显然的不同；可是在精神上实在是一贯的。没有‘老张’，绝不会有‘老赵’。‘老张’给‘老赵’开出了路子来。”^①这话的值得玩味之处，是由其所挑明的两者精神上的一贯性。其实，不仅写学生风潮的《赵子曰》，就是到似乎是进行“国事”批判的《猫城记》，其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都是一以贯之的。在老舍的笔下，无论是赵子曰等人的闹学潮行为，还是猫国政客们的“哄”斗，都是作为“国民性”的必然表现而予以表现的。在《赵子曰》中，文化批判的意味弥漫全篇，所有人的言行及其社会性环境，无一不表现为文化的结果。最为作者感到锥心之痛的，是国人对“国家观念”的缺失。他借小说中人物李景纯的口，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因保存一个古迹至于流血杀人”时说道：

一个民族总有一种历史的骄傲，这种骄傲便是民心团结的原动力；而伟大的古迹便是这种心的提醒者。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所以英法联军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德国人搬走了我们的天文台的仪器，我们毫不在意！这是何等的耻辱！试问这些事搁在外国，他们的人民能不能大睁白眼的看着？试问假如中国人把英国的古迹烧毁了，英国人

^① 《我怎样写〈赵子曰〉》。